

doi: 10.3969/j.issn.2097-3853.2026.02.001

# 跨文化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话语体系国际传播研究

钱俊霖, 余思新

(闽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漳州 363000)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符号化表达, 其以“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标识性概念为核心,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中华文化的深度融合。其国际传播作为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认知霸权、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路径, 既承载着阐释中国道路合法性的理论使命, 也肩负着重构全球话语秩序的现实责任。当前, 国际传播面临历史积淀中的代际断裂与双重场域下的实践梗阻, 表现为符号资本积累滞后、传播机制代差、文化逆差心理惯性, 以及国际制度排斥、文化偏见过滤与国内话语转换梗阻的叠加挑战。对此, 需坚持主体性、时代性、人民性三大原则, 协同推进理论创新与传播实践,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在破解“中西对立”思维、构建多元现代性对话中,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提供中国智慧, 铸牢民族复兴的精神根基。

**关键词:** 跨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 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 D61; G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3853(2026)02-0103-07

##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cross-cultural conditions

QIAN Junlin, YU Sixin

(School of Marxism,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rves as a symbolic expression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entered on iconic concepts such as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achieves profou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fundamental tenets of Marxism, Chinese practices, and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As a critical pathway to dismantle Western-centric cognitive hegemony and promote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its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bears dual responsibilities: theoretically legitimizing China’s developmental path and practically reconstructing the global discourse order.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faces compounded challenges rooted in historical sedimentation and dual contextual barriers, including lagging accumulation of symbolic capital, generational gaps in dissemination mechanisms, psychological inertia of cultural deficits,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exclusion, cultural prejudice filtering, and domestic discourse conversion blockages.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necessitates adherence to three principles—subjectivity, contemporaneity, and people-centricity. Through synergistic advancements 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practices,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provide Chinese wisdom for exploring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by deconstructing the “East-West antagonism” mindset and fostering dialogues on pluralistic modernity, thereby fortifying the spiritual foundation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words:** cross-culture;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收稿日期: 2025-04-10

第一作者简介: 钱俊霖(2000—), 男, 广东陆丰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通信作者: 余思新(1971—), 男, 浙江衢州人,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党的建设理论。

恩格斯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sup>[1]</sup>术语革命不仅是学科知识生产的标志，更是理论体系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作为规范化的语言符号系统，话语体系“是指一定话语主体以规范化的语言符号在表达和传播文化知识、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完整言语系统，体现为学科发展中的一系列标识性概念”<sup>[2]</sup>。换言之，话语体系承载着文化传播、思想理论阐释与价值观念表达的核心功能，其形成与发展始终依托于学科演进中的标识性概念。基于这一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本质上是一场立足中国大地的“术语革命”，是在“解决中国问题、阐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过程中概括出的具有中国风格与民族气息的话语形式”。<sup>[3]</sup>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由一系列回应现实、引领实践、彰显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如“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生成方法论和思想导向，以中国实践为内容根基，以中国式独特表达为外在表征，以多样和广泛的传播为实现路径，是综合内在的话语内容和外在的话语表达、话语传播所构成的集合体。<sup>[4]</sup>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sup>[5]</sup>当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其发展经验与制度优势亟待转化为具有解释力与感召力的话语资源。因此，“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sup>[6]</sup><sup>[317]</sup>，着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国际传播，这是“积极向世界宣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价值，分享中国方案，共享中国智慧，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选择”<sup>[7]</sup>。

## 一、跨文化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国际传播的价值维度

在全球化深度演进的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不仅是理论逻辑的必然延伸，更是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文明对话的时代命题。这一传播实践的价值维度，既植根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内生动力，也映射着跨文化语境中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认知霸权的现实诉求，更承载着民族复兴进程中跨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历史使命。具体而言，其价值可从理论阐释、文明互鉴与精神认同三重向度展开分析。

### （一）彰显中国创新理论，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sup>[8]</sup>，揭示了话语体系与理论创新的本质关联。学界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演进，形成了具有范式意义的理论构建。有学者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构成归纳为“以阶级解放为目标的革命话语（1921—1949）、以生产方式解放为目标的建设话语（1949—1978）、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改革话语（1972—2012）、以梦想实现为目标的复兴话语（2012年至今）”<sup>[9]</sup>。也有学者以话语体系的基本要素为出发点，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关系要素构成的系统，包括话语基础、话语核心、话语体系、话语方式、话语自信、话语传播、话语权和话语创新等八个层面”<sup>[10]</sup>的观点。这些系统性研究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内在建构，更通过学理阐释为其国际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作为融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中国现实问题导向、中华文化基因和人民价值立场于一体的理论集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标识性概念群，又彰显出中国人独特的思维特征与价值范式。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国际传播，有利于让世界对中国理论创新的生成逻辑形成系统性认知，即明确它既非简单移植外来理论，也不是孤立的本土经验，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大地、回应时代课题、传承文化根脉的创新性理论体系。

### （二）破解西方中心主义认知范式，构建文明互鉴新格局

在全球化语境下，理论传播模式差异映射出文明演进的不同路径。国际上长期存在的“传播即霸权”认知定势，实则是在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曲解非西方国家的理论创新。这种认知习惯易将中国经验的价值输出简单等同于“文化侵略”，并以一贯采取的“文化封闭”“文化霸权”等策略对中国文化传播途径进行封锁，对传播方式进行限

制,传播内容进行扭曲”<sup>[11]</sup>,这实为用殖民主义思维范式裁剪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历史生成机理,恰恰构成破除这种认知迷思的密钥,因其理论内核是始终贯穿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这与西方霸权逻辑形成了根本性分野。从国际传播史维度考察,资本主义现代性支配下的理论输出往往伴随着“中心—边缘”的权力结构再生产(如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中的意识形态捆绑),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自延安时期确立“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起,就开创了“文明对话而非文明征服”的传播范式。这一话语体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确义利观”等理论构件为支撑,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观嵌入话语表达,其国际传播本质上其实是通过理论叙事再现中国发展道路的和平性、文明性。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经验升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例如,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到全球发展倡议对联合国2030议程的对接等,都印证着话语体系与实践创新同构关系。“理想的国际传播理应遵循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以充分尊重别国需求为要义的新型义利观。”<sup>[12]</sup>这种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和合”基因、淬炼于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理论体系,为突破“文明冲突论”提供了全新范式。因此,推动其国际传播不仅是理论主张的宣示,更是通过概念体系重构推动国际话语秩序变革,使世界得以在超越“中西对立”的思维框架中,客观认知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 (三) 强化理论主体性建构,铸牢民族复兴精神根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效能,也体现着理论创新与价值认同的辩证统一。不同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单维度的理论输入,当代中国理论创新的外向传播是从“学徒状态”到“自主知识生产”的历史性跨越。这种跨越在认知维度上形成了对外通过国际对话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解释力,对内则借助“镜像效应”增强民众对本土理论体系的认同强度。以脱贫攻坚理论为例,其在国际发展学领域中所引发的“中国方案”研究热潮,不仅解构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国际学术共同体的价值确认,使国内民众直观感知马克思主义反

贫困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诞生的真理力量。这种内外互动的理论确证过程,本质上是在全球思想场域中完成“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立体化论证。而更深层的价值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重构了国民精神世界的坐标系。当“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原创性概念进入联合国发展议程和全球治理话语体系时,民众在文明对话中建立起“以中国为方法”的认知框架。这种框架的建立,不仅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还在比较政治视野中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正如“历史终结论”的式微与“文明多样性”共识的兴起所昭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全球在场,正在塑造着新时代中国人民精神世界的主体性建构,既保持对中华文明根脉的深度认同,又具备参与人类文明创新的理论自觉,这种双重特质不断铸牢着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最深沉的精神力量。

## 二、跨文化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国际传播的实践梗阻

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具有显著价值,其实践过程却始终面临着历史逻辑与现实矛盾交织的复杂挑战。若将价值维度视为理论传播的“应然”指向,实践梗阻则揭示了“实然”境遇中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既深植于中国近现代知识生产的代际断裂,又凸显于国际国内双重场域的话语博弈,亟须从历史积淀与现实困局的辩证关系中把握其本质。

### (一) 历史积淀中的结构性张力——理论传播能力的代际断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困境,深植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特殊演进轨迹。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启“西学东渐”浪潮,中国知识界曾长期处于从理论输入到实践调适的单向循环,这一历史境遇塑造出特定的“接受型”知识生产模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突破这种历史惯性,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相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重大理论成果。这种理论创新本质上是对单向循环的历史超越,实现了从

被动接受到主动创造的范式转换。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即便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理论被引入并在中国落地生根,其传播初期仍需借助“经学阐释模式”实现在地化转化,这种“借壳生蛋”的传播策略在革命年代虽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却为当代理论输出的主体性建构埋下认知障碍。

因此,需要辩证看待的是,当前存在的代际张力本质上是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现象。相较于在理论创新上实现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当前在理论传播方面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其一,符号资本积累的时空错位。西方主流学术话语历经300余年殖民扩张与全球治理实践,实现了“地方性知识”向“普世价值”的符号转换。而中国理论体系在霍米·巴巴所谓的“文化翻译”场域中,正处于从“被阐释对象”向“阐释主体”加速转型的关键期。其二,传播机制建设的代差效应。新自由主义话语通过“学术共同体—媒体网络—基金会体系”三位一体的传播矩阵,构建了自我强化的知识权力网络。相比之下,中国的理论传播仍存在“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大众话语”的转换梗阻,其构建需要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有机融合”<sup>[13]</sup>。其三,文化逆差的心理惯性。虽然中国共产党通过持续的理论创新极大增强了文化自信,但部分知识群体仍存在将国际认可简单等同于西方认证的认知偏差。这种历史记忆的残留效应,恰恰凸显出新时代加强理论体系主体性建构的迫切性,亟须通过更具说服力的学术原创和更有效的国际传播来彻底破除。

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兼具“解殖性”与“在地性”的双重特质。当它作为“批判的武器”时,其西方思想渊源构成话语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其作为建设性理论进行国际传播时,本土化特质又容易遭遇“身份认同”的尴尬困境。这种悖论在“历史终结论”破产后的全球思想市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既要证明自身相较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超越性,又需要在文明对话中确立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坐标,无疑对传播主体的叙事智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 (二) 双重场域中的传播困局——认知壁垒与话语失衡的叠加挑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也面临着国际国内双重视域下的复合性梗阻。在国际

传播场域,三重认知壁垒形成了复合屏障。第一,制度竞争引发的话语排斥。“世界各国国家所处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可以说是相互独立的,这也是对外传播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挑战。”<sup>[14]</sup>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道路的制度探索污名为“非民主化模式”,通过设置“自由民主”的单一评价标准,不断消解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解释力。第二,文化偏见的过滤效应。基于跨文化传播理论中的“文化维度模型”,高权力距离与低语境表达体系的认知差异被西方媒体刻意放大,“西方文化对非西方世界的一种主观审视,是以西方天然先进的先验性假设为前提的一种审美标准和叙事方式,是把西方和非西方文明对立起来的一种文化观”<sup>[15]</sup>。在这种方式下,会形成诸如东方就是怪异、落后、野蛮愚昧、粗暴的等观念。同时,基于殖民历史形成的东方主义认知框架,西方舆论场惯用“锐实力”等概念置换中国对外传播的正当性,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常被曲解为“地缘扩张”的政治工具。第三,语境差异导致的意义损耗。根据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中华文化特有的高语境表达方式(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文明观),在跨文化传播中往往遭遇简化解读,造成核心价值理念的传递失真。“各国由于地理位置、宗教信仰、历史风俗等因素,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分类,且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思想价值观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不同文化在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这会造成对文化理论的误读。”<sup>[16]</sup>

国内话语场域面临的双重失衡也同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构成挑战。其一是评价标准的自我边缘化。中国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一些“西方指标崇拜”现象,导致“失语、妄语情况严重,也就限制了人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认知”<sup>[14]</sup>,而将国际期刊采纳率等同于理论价值尺度,导致本土理论创新陷入“他者认证”的认知误区。其二是话语转换的机制短板。政治话语的体系化表述、学术话语的范式化研究与大众话语的通俗化传播之间尚未形成有效衔接,造成对外传播中依旧常出现“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数字时代的传播格局加剧了话语权的不对称,如一些西方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塑造的“信息茧房”,使中

国声音在关键议题上频频遭遇“可见性压制”,从而严重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对外传播效果。可见,这种双重困局的实质,是百年变局中文明对话范式的转型阵痛。当中国试图去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时,不仅要应对外部既得利益集团的认知围堵,又需要克服自身知识生产体系的历史惯性。而破解困境的关键,在于既要立足文明根性去阐释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又要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方案,从而在文明交流的辩证运动中实现话语权的渐进重构。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困境,本质上是历史逻辑与现实矛盾交织的复杂产物。从历史维度看,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形成的知识生产路径依赖,导致理论传播长期处于“输入—调适”的单向循环,使中国在全球话语场域中面临符号资本积累滞后与主体性建构不足的压力。代际断裂的深层症结不仅在于传播机制的技术性代差,更在于知识权力体系中“阐释者”与“被阐释者”角色的历史错位。从现实维度看,国际场域的制度性排斥、文化偏见过滤与语境差异损耗,与国内场域的话语转换梗阻、评价标准异化相互叠加,形成制约理论传播的复合型屏障。这种困境既折射出新旧文明秩序交替期的认知博弈,也暴露出全球知识生产体系中“中心—边缘”结构的顽固。

### 三、跨文化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国际传播的原则坚守

破解实践梗阻、实现价值目标,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属性与时代使命。面对代际断裂的传播困境与双重场域的话语博弈,唯有以主体性锚定文明根脉、以时代性回应全球之问、以人民性筑牢价值底线,方能在历史逻辑与现实诉求的辩证统一中开辟国际传播新格局。这三大原则的协同推进,既是对既有挑战的系统回应,更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选择。

#### (一) 主体性原则:突出中国特色的话语符号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sup>[17]</sup>,这一重要论述为破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国际传播的代际断裂与认知壁

垒提供了根本遵循。面对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符号资本错位与传播机制代差,唯有通过系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符号体系,才能突破“他者认证”的认知窠臼,在文明对话中实现从“被阐释者”向“阐释主体”的范式转换。

突出中国特色的话语传播,首要任务在于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不仅要聚焦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中国正在做的事情”,更要提炼其背后蕴含的文明基因与价值密码。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既是对西方“程序民主”范式的理论超越,更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其解释力植根于中国政治实践中“民惟邦本”与“民主集中”的辩证统一。

针对国际传播中的语境差异与意义损耗,必须构建基于跨文化适应理论的多层级话语转换机制。在学术话语层面,要突破“以西释中”的路径依赖,创建符合跨文化认知规律的阐释框架。例如,用“政党—国家—社会”替代西方“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范式,通过文化转译(cultural translation)策略阐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在政治话语层面,需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转化为跨文化可通约的全球治理方案,通过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制度话语权的积累,实现价值理念与制度实践的互证;在大众话语层面,要善用数字时代的叙事方式,将“共同富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话语转化为可视化的故事文本,借助 TikTok、微信、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实现“沉浸式传播”。

面对文化逆差的心理惯性,必须建立自主的学术评价体系与话语生产机制。这要求我们在理论创新中强化“中国标准”的主体自觉,既要超越将 SSCI 期刊录用率等同于学术价值的评价异化,也要警惕“用中国材料印证西方理论”的知识生产模式。当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本质上是在打破新自由主义知识权力网络的三位一体结构(学术共同体—媒体网络—基金会体系),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导向作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协同创新、国际学术组织中国学者群体的代际更替,逐步扭转“文化翻译”场域中的权力关系,从而明确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并非是要建立新的文化霸权,而是要在

文明互鉴中实现多元现代性的平等对话。

## (二)时代性原则:回应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供给

话语体系作为中国智慧、中国形象的展示,除了要坚持“突出中国特色”,还必须要以回答世界之问为目标进行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sup>[6][317]</sup>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国际传播,不能单纯地将中国传统思维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倾倒地传递给世界人民。另外,面对全球治理赤字加剧与文明冲突论沉渣泛起的双重变局,仅仅依靠文化特殊性的单向阐释已难以穿透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壁垒。基于此,唯有将中国叙事置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坐标中,以回答“世界之问”为导向重构话语逻辑,才能在破解“锐实力”污名化叙事的同时,实现从“中国话语”到“世界议题”的范式跃迁。

体现时代视野的核心要义,在于建立全球性问题与中国方案的意义联结。当前国际传播面临的语境差异损耗,实质上是地方性经验与普适性诉求的辩证张力未获有效调和所致。而破解之道在于构建“双向互释”的话语框架,既要从共同富裕实践中提炼“发展正义”的伦理内核,也要将其置于全球发展赤字治理的坐标系中进行价值定位;既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彰显“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更需转化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性公共产品。例如,全球发展倡议通过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度耦合,成功突破“中国模式输出论”的认知陷阱,其传播效能正源于对“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这一时代之问的精准回应。

在文化逆差的心理惯性与制度性话语排斥交织的传播场域,迫切需要构建“共同语义场”实现认知突围。这要求我们要超越“体用之争”的传统思维,在数字文明、人工智能治理、太空开发等新兴领域主动设置议题。具体而言,可以实施三重战略转向:其一,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转化为全球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方案,如用“全过程人民民主”阐释技术垄断下的民主重构路径,以“新型举国体制”回应重大科技攻关的协同难题;其二,运用“文明对话”范式替代“文明冲突”叙事,通过“一带一路”考古合作、敦煌学国际研讨

等载体,在人类文明史维度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多元文明演进的内在关联;其三,创建“问题导向”的话语再生产机制,针对全球债务危机、产业链安全等痛点,将中国的制度型开放实践转化为“去风险”与“再联结”的平衡智慧。

数字时代的传播格局革命,为破解代际断裂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例如,在平台维度,依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5G通信网络等数字基建,构建跨文化技术赋权的新型传播生态,打造自主可控的国际传播技术底座;在内容生产层面,运用元宇宙、生成式AI等技术手段,通过跨文化符号的具象化叙事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象化为虚拟空间中的沉浸式体验;在主体培育方面,可以通过TikTok学术科普、B站国际版知识共享等路径,实现理论话语的“代际翻译”。

## (三)人民性原则:技术赋能与价值底线的辩证统一

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sup>[18]</sup>,这一论断不仅确立了人民在话语权上的主体地位,更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哲学。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也同样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sup>[19]</sup>这一重要论述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国际传播的根本红线:必须始终以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内核,警惕将“国际接轨”异化为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被动适配,更不可因追求“他者认同”而陷入价值让渡的陷阱之中。

坚持站稳人民立场,关键在于破解国际传播中的“价值错位危机”。当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正通过“人权—威权”“民主—专制”等二元对立框架,将中国的发展叙事扭曲为“国家主义压制个人权利”的刻板印象。若为迎接所谓“普世价值”标准,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简化解释为“选举程序优化”,或将“共同富裕”降维对标“福利社会”,实则是对西方概念“规训”中国实践,本质其实是对人民主体性的消解。面对这种挑战,必须坚守“人民至上”的叙事逻辑。例如,在阐释“脱贫攻坚”时,需突出“志智双扶”对个体发展权的赋能意义;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时,应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背后民生福祉

与生态正义的统一。

在数字时代的话语博弈中,站稳人民立场需转化为“技术向善”的传播策略。当前,如前文所述,算法推荐机制正加剧“信息茧房”,西方社交媒体平台通过选择性放大个案矛盾,试图割裂中国政策与人民利益的内在关联。对此,必须构建“人民在场”的传播新范式。例如,可以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脱贫攻坚成果的“不可篡改型”数据库,将中国贫困村的蝶变历程转化为可追溯、可验证的“数字故事链”;可通过短视频平台发起“人民镜头下的中国”全球共创计划,让新农人直播带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技艺展示等原生态内容,直接构成国际传播的“元文本”;可以依托数字孪生技术打造“人民城市”虚拟展馆,以沉浸式体验呈现15分钟社区生活圈、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的微观治理智慧。这种“技术赋能人民叙事”的路径,既能规避西方平台的议程操控,又能以具象化场景打破“抽象概念”的认知隔阂。

从更深层看,站稳人民立场要求在国际传播中重构“主体间性”。不同于西方“精英—大众”的垂直话语结构,中国实践始终强调“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因此,必须创新三种对话机制:其一,建立“政策—实践—反馈”的全球传播闭环,如将“民生议事厅”“村民说事”等基层协商民主实践,转化为破解全球治理“民主赤字”的制度性方案;其二,推动“人民故事”与“学术话语”的互译转化,如用云南“直过民族”脱贫案例诠释“发展权”的文明多样性维度,以义乌“世界超市”的商户群像解码“市场活力”的人民性根基;其三,构建“问题共研—成果共享”的国际合作网络,针对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人类共同挑战,将中国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民生工程,转化为可操作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总而言之,这种以人民性为底色的国际传播范式,既是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实践超

越,也是对西方“元叙事”解构潮流的创造性回应。当“人民”不再是被言说的客体而是叙事的主体,当“为人民服务”从政治承诺转化为可感知的发展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便获得了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

####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是一场跨越文明藩篱、重构知识权力的深刻实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符号化表达,其不仅承载着解码中国道路、阐释中国经验的历史使命,更肩负着打破西方话语霸权、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时代责任。从“术语革命”的视角审视到跨文化传播的视域分析,这场传播实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当代验证,也是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转型中实现主体性觉醒的关键路径。面对代际断裂的传播困境与双重场域的话语博弈,唯有坚持主体性、时代性与人民性的原则,才能在历史逻辑与现实诉求的辩证统一中开辟国际传播新格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知识生产体系正经历结构性重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既需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智慧回应“世界之问”,也需要以数字技术赋能话语表达,通过“技术向善”的叙事策略突破信息茧房;既要在文明对话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方案,也要在“人民在场”的传播范式下构建可信、可感的价值认同。这要求我们要以更开放的理论自觉,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全球治理的实践共识,将“中国之治”的微观经验升华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财富。唯有如此,方能在文明互鉴的宏大叙事中,实现从“他者认证”到“自主定义”、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引领”的范式跃迁,为人类思想市场的多元繁荣注入中国智慧,为民族复兴的精神根基筑牢话语长城。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
- [2] 袁银传,于芳.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其相互关系[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5,11(2):97-108.
- [3] 李影,韩喜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及其形成[J].湖湘论坛,2016,29(4):40-45.

译小说序跋中“西学为用”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新文化革命的一种酝酿。由此可见,林纾站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节点上,有着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与意义,这也正是百年后我们仍然纪念

这位杰出人物的原因。若是跳出历史场域,其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对西方文明的扬弃也是新时代建立中国话语的应有态度。

### 参考文献:

- [1] 马悦欣. 林纾英语小说汉译的序跋研究[D]. 大连:大连外国语大学,2022.
- [2] 张书宁. 林纾“译笔”研究[D]. 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22.
- [3] 崔璨,李莹莹. 从林译副文本看林纾翻译的爱国动机[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3):108-111.
- [4] 郝翠屏. 从林译小说序跋看林纾的文化自觉[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9(6):44-48,87.
- [5] 郑晓岚. 二元对立话语模式与林译序跋的现代性[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3):333-336.
- [6] 黄晓燕,金进. 从林纾和梁启超的分歧看中国现代小说观念的冲突[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1):151-160.
- [7] 林纾. 林琴南书话[M]. 吴俊,标校.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 [8] 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M]//梁启超全集:第4卷. 沈鹏,范增,李铎,等. 主编.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884.
- [9] 康有为. 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J]. 庸言. 1913(1).
- [10] 朱晓慧,庄恒恺. 林纾:近代中国译界泰斗[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90.

(责任编辑:王圆圆)

(上接第109页)

- [4] 郑洁,夏吉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构建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26.
- [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34.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7] 杨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外传播研究[D]. 长春:长春大学,2023.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13.
- [9] 欧庭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百年探索与经验总结[J]. 大连干部学刊,2022,38(2):12-18.
- [10] 韩庆祥. 中国话语体系的八个层次[J]. 社会科学战线,2015(3):1.
- [11] 纪中强,王一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播的价值、困境及体系构建[J].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8(1):17-21.
- [12] 宋航,何天平. 以国际受众为中心:计算国际传播的理念迭代、应用路径与潜在风险[J]. 对外传播,2025(3):9-13.
- [13] 张明. 新时代建构中国话语的基本路径[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24(1):50-57.
- [14] 秦潇. 对外传播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与应对[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7,1(21):9-10.
- [15] 金民卿.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外传播的挑战与应对[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4(3):1-7.
- [16] 李竞,谢思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国际传播[J]. 党史博采(理论),2014(6):10-12.
-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4.
- [18]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8.
- [1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9.

(责任编辑:王圆圆)